

点,戴震认为:“《毛诗序》传自毛公,以为子夏之学。虽不子夏所为,要之师承当不诬。”而作者利用新近出土的《上海博物馆楚竹书·孔子诗论》相比证,认为“前人以《诗序》为后汉人所作,而舍《诗序》以论诗的做法是错误的”(435—438页)。这种由历史文献与出土文献相互证发,完全可证戴氏为《毛诗序》所做存真辩护的正确性,也反映出作者对戴震学术思想研究的深入,且具有相当广博的知识素养和识断能力。

四是创新点多。本书中提出的许多问题,前人多未涉及,作者首次提出,可以说几乎每章每节都有新见解。譬如,作者在第一章溯源探流,把戴氏的考据学放在中国学术发展史的大背景下,从人物生活的时代背景、徽州地域文化环境,及戴震个性特点与为学状况等方面,论说戴氏学术形成及其特点,言而有据,颇具历史眼光。其中对戴震独特的生活经历造就了他的独特治学之路,论证尤为新颖,富有启发性。第二章、第三章是论著的重心,讨论戴氏考据学成就的许多方面,既能够把握住戴氏的学风特点,又能在理论上

加以归纳和总结,所论多有新见。第四章从戴氏考据学方法角度,论证戴震的“由博而约,学贵精审”、“探赜索隐,注重归纳”、“大胆假设,小心求证”的治学特色;第五章从“以词通道,明经致用”、“实事求是,空所依傍”、“通达公允,不存偏见”等方面阐释戴氏的考据学思想,皆能从学理的高度进行总结,提升了论著的学术层次,凸显了论著的学术价值。作者在《余论》中对清代学术派别的分析,亦甚有见地,认为扬州诸学派是承戴学而弘扬之,开拓领域,衍其薪传,因而扬州学术不过是“戴学在扬州地域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和更高更全面的阐扬而已”(678—688页),作者不剿旧说,文有新见。

当然,书中也有一些不足之处,如戴震作为清代朴学的代表人物,其局限与弱点似应联系更广阔的时代背景加以揭示与说明;总结戴氏考据学成就,个别例证尚可再斟酌。然而,瑕不掩瑜,该书不失为一部徽州历史文献研究的开拓之作,为今后深入研究清代学术,尤其是对徽州地域文化的研究启示了一个良好的开端。

《宁可史学论集续编》读后

刁培俊 (厦门大学历史学系 福建厦门 361005)

全相卿 (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北京 100037)

首都师范大学教授、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宁可先生,从事史学研究已六十余年,对于史学理论、中国经济史、敦煌学、隋唐五代史诸领域均多有创获,成就卓著。其论著多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集结出版为《宁可史

学论集》(1999年)。2008年,中华书局出版了宁先生的第二本论文集——《宁可史学论集续编》。本书是先生近十年来成果的新总结,也是他笔耕不辍,孜孜以求的最好见证。

本集共收录论文16篇,计20万字。综

观本书,主要包括六个方面的研究成果:第一、对史学理论中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,即从认识论角度探讨了“历史是什么”,从方法论角度考察了“马克思主义与历史研究的关系”;第二、论述了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的某些侧面,包括“吏治的得失与借鉴”、“王朝兴衰周期律”和“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”等问题;第三、对隋唐五代时期的历史进行简要概括,诸如时代风貌、政治状况、思想文化、社会生活、转型期经济等方面,均包含其中;第四、注重对中国古代经济问题的考察。这组论文主要从农器的变化、商品经济的发展、封建经济的结构和运作等层面进行分析;第五、着重阐述文化方面的问题,包括“文化的随想”、“斯坦因骗盗敦煌文物的过程”、“敦煌的历史和文化”以及“敦煌文献在历史研究中的意义”等;最后,是有关宁可先生的学术经历。

宁先生在半个或多个世纪的治史过程中,以其深厚的理论素养、开阔的学术视野、严谨的治学态度、丰硕的科研成果,得到了学界的一致尊敬。今谨就本书的一些特点,略谈一下读后的体会。

第一、理论素养醇厚,善于从理论的视角、高度把握历史的现象和本质。在当下的历史研究中,研究者尤其是年轻一代多注重各种理论的运用,但马克思主义往往却被认为是一种固定的框架,一种僵化的模式,一种教条式的规范,在具体研究中往往明扬暗弃。宁先生明确指出:“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历史整体的基本要求的认识,是经受了时间的考验,经受了实践的检验的。”(第17页)他认为,“辩证法是一种基本的、总体的方法,它并不排斥其他的科学方法,好些科学方法其实是辩证法基本精神或者某些方面的一种深化、精确化和具体化”(第19页)。在这一理念下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,“是可以提高

我们历史认识的能力和水平,是可以再求真的道路上前进,是可以使我们的研究更加科学的”(第19页)。此外,对于历史学理论的阐发、论述,眼光独到,见识超远。他认为“历史学和历史科学本身并不是客观历史存在的历史,而是以客观存在的历史为对象的一门学科”;以及“‘史学理论’不单单是历史学,而是‘史学学’,如同‘科学学’一样”(第13页)。由此可见宁先生对历史学科本质的深刻理解,显示出其广博而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,对于当前史学理论学科建设来说,颇具现实意义和方向性指导价值。

第二、关于封建经济结构、经济运作及特征的研究,卓有创造与发明。宁先生是一位功力深厚而又慧眼独具的史家,在有关经济问题的数篇文章中,把一些经济史研究中司空见惯的概念、论题重新界定和分析,通过自己深入研讨,最终揭示封建经济结构的某些特征。宁先生认为,我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和体制特征主要有四:一是中国封建经济以个体小生产农业为生产力的主干,这是它的基本特点;二是封建经济的运转有大、小两个循环,即自行消费,然后再生产的小循环和经过市场流通,最后完成消费的大循环;三是封建经济结构由农民、地主和封建国家三个板块组成;四是封建经济中的商品经济值得重视。他指出,封建经济基础是“小农经济”的说法,忽视了占主导地位的地主经济,忽视了自耕农以外的众多佃农和雇农;并进而强调,“封建经济并非是一个绝对封闭静止的系统,它具有相当的开放性和活动性,商品经济就是这种开放性活动的因素”(第153页),等等,均是宁先生在经济研究领域高屋建瓴,见识超远的体现。

第三、宁可先生本阶段的研究重点,较多表现出对历史的反思,在研究中饱含强烈的现实关怀。历史研究对学者更深层次的要

求,是启迪智慧,让读者既能感悟过去,又能体味当下,并能指向未来,这不仅要求史家对历史事实有深刻的洞悉,而且,还必须具备强烈而敏锐的现实意识。只有这样,其研究成果才更具生命力。这是老一代著名史家“人文关怀”的具体体现。例如:对吏治得失的论述,指出古代“吏治”中“干部决定一切”的错误,并着重阐明了“古代吏治可资借鉴之处”,值得引起读者对现实的思考。另外,宁先生通过对“中国王朝兴亡周期律”的剖析,指出了“一个统治者如何对待农民,成为一个王朝成败的关键”,“一个王朝之所以衰亡,很大的来源是吏治的腐败”等等,给读者以智慧的启迪和反思。

此外,宁可先生曾经亲身参与了《英藏

敦煌文献》、《敦煌文献分类录校丛刊》等项目的研究和编撰工作,这些均为敦煌学发展中具有重大意义的基础性工程。在长期与敦煌文献的接触过程中,宁先生自然对敦煌文献之流失有深刻的看法,这已在其行文中不经意流露出来。对斯坦因盗走敦煌文物过程的考察,对敦煌的历史和文化以及敦煌文献的论述,表现出宁先生作为历史学家的一种责任感和一种期待,蕴含了他的深邃的爱国主义思想。

要之,宁可先生科学的研究方法和孜孜不倦的研究精神,为后来者树立了很好的榜样。书中所显现出宏大的意旨,深邃的思想,缜密的思维,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。

《唐代服饰时尚》出版

古人的衣食住行是物质生活史研究的对象。“衣”字当头,这是因为人类自告别了蒙昧时代,就懂得了用树叶及兽皮遮蔽自己的身体。概念意义的衣服诞生了,羞耻由此而生,衣着打扮亦由此而生。我国古代的服饰,包括佩饰,在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,经历了几次变化,其中唐代变化最大,最具特色。最近我读到一部关于唐代衣着服饰的研究专著——纳春英《唐代服饰时尚》(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8月出版,异型16开,328个页码)。

这部《唐代服饰时尚》是目前少见的断代史服饰研究专著。诚如著名唐史专家黄正建先生在该书序言中说的那样:“关于唐朝服饰的专门著作还不多。仅有的几种都过于简单,而且基本都是研究服饰史或艺术史的学者撰写的。真正由研究唐史的学者来撰写的唐朝服饰史专著基本还是空白。如果有,

这部书就是第一部了。”黄先生给予作者纳春英女士及她的著作极高评价,让我们难以置喙聒噪。

一部书的好坏,先看选题立意的高下。这部书选题新颖、时尚,符合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需求,因为拍摄影视剧,创作历史题材的小说,都需要某个断代史服饰的图像资料和文物遗存及文献资料。这部书正好满足了文化工作者的多种需求,因而这是一部贴近实际、贴近生活、贴近群众的,提升大众文化水平的好书。

有了好的选题,还要有能驾驭史料、材料的高水平的作者。纳春英女士就是这样的学者。她潜心研究唐史二十年,多年醉心于唐代服饰研究。她以《旧唐书·舆服志》和《新唐书·车服志》为经,以唐代政书、类书、笔记小说等为纬,广泛收集资料,多达一百多